

澳門文學的區域性意義

張建華

提 要：澳門文學是中國的一個區域文學。它同中國其他區域文學相比，可以說是同又不同。同的地方是澳門文學以中華民族文學為底色，帶有深刻的民族文化
和民族文學的烙印。不同的地方是在於澳門的區域的特殊性，澳門文學有其獨特的
發展足跡。從中國文學發展的整體格局來看，缺少澳門文學這個具有獨特風貌、
獨特發展足跡的區域文學，將是不全面的、不完整的。澳門文學具有豐富的
區域性意義。

關鍵詞：澳門文學；區域性質；意義

香港作家何紫在1986年舉行的“澳門文學座談會”上指出，研究澳門文學有三種意義：一是可以為中國文學這一百花園地增添“新株”；二是可以反映澳門本地有異於中國內地人民的思想感情與文化面貌；三是逐步剷除文學的殖民地色彩，抗衡惡質文化與渣滓文化。這種見解，在當時當地固然有其正確的道理，而且還會繼續下去，但它畢竟是20多年前的表述，已不能涵蓋今天澳門文學的意義了。如果站在21世紀社會、經濟、科技、文化等急劇變革現狀的制高點上來審視，如果把澳門文學的發展歷程放在現代學術視野中去探討，澳門文學的區域性意義還應該有以下三點。

一、澳門文學區域性意義的研究，可以補充和豐富整體中國文學研究的內涵

澳門文學的發展與整體中國文學和全國其他區域文學相比，可以說是同又不同。同的地方是，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

一個成員。澳門文學的底色是中華民族文學的底色，澳門文學帶有深刻的中華民族文學烙印。澳門文學是整體中國文學的一個特殊的區域文學，它的發展當然不會背離整體中國文學的發展總規律。它的發展與整體中國文學的發展關係，是局部與整體的關係。中國文學尤其是民族傳統文學中所具有的主要特色，比如，中國文學的長河，是以詩歌為主流的。中國詩歌的歷史源遠流長，如果從《詩經》算起，也有三千多年了。從那時以來，出現了眾多優秀詩人和優秀作品，詩歌的優良傳統一直沒有中斷過。澳門古、近代文學的主要形式同樣是詩歌。1983年，香港詩人何達到澳門講詩，盛讚澳門是“詩的基地”，此說不算誇張。中國詩歌的樂觀精神、憂患意識、尚善態度、含蓄雋永而又明快爽直的藝術風格，等等，這些中國文學所具有的共性，澳門文學也同樣具備。關於這一點，澳門作家李鵬翥說得非常貼切：“不管是中國內地、臺灣、香港以及澳門，甚至海外的華文文學活動和文學的根，都是與中國文學分割不開的。雖然在港澳、臺灣和海外的華文文學創作是受外國文學創作的影響的，但華文文學流淌着的血，總是有中國的血，有中國文學傳統的血緣。”^①不同的地方則是，區域文學發展與整體中國文學發展相比較，在於它的區域的特殊性，就是它獨特的發展足跡。

一個地域或區域的價值，不一定在於它面積的大小、資源的貧富和人口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還在於它地位的重要性。這個地位，可以是自然地理的，也可以是人文地理的。澳門雖然地域狹小，資源貧乏，但作為中西文化交流在我國最早中心地位，其文化地理價值是巨大而獨特的，其影響深廣而久遠，是我國其他地域或區域所不能替代的。季羨林在《澳門文化的三棱鏡》一文中說：“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人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在時間上是明末清初，在地域上就是澳門。……澳門文化是人類迄今四百多年東西方兩種異質文化逆向交流和多元融合的獨特產物，澳門的精彩之處和它對於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的重要性，也就在於那經由長時間東西文化交融所產生的客觀存在的人文價值方面。澳門文化不只是人類一份值得珍惜的文化遺產，它必然

^① 李鵬翥，《濠江文譚》（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1994），11。

要在東方的新世紀裏繼續閃爍獨特的光芒。”這種表述，有助於對澳門文化與文學的歷史和現實意義的進一步理解和認識。在中國的區域文學研究中，或許沒有哪個區域的文學發展如澳門文學那樣，其興衰起落存在着如此急劇而強烈的反差；也沒有哪個區域的文學如澳門文學那樣，有着如此複雜而多元的文化背景和內涵。劉登翰說：“它提供我們的思考，不只是澳門文學自身，更重要的或許還是文學興衰起落背後的歷史和文化。澳門文學能夠自成一種景觀，超越它的自身，引起世人的興趣，恐怕首先也在這裏。”^②這段言說給我們的啟示是：較之其他地域或區域文學，澳門文學自身具有獨特的發展足跡，其中它背後的滄桑歷史文化是構成澳門文學特質的重要因素。

近年來，中國文學發展歷程的總體研究論著，諸如各類文學發展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無論任何一部文學發展研究論著，都只能觀照文學發展的總規律，論述重要和比較重要的文學運動、文學流派、作家和作品，不大可能更多地關注大多數地域或區域文學的局部問題。比如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的十卷本《中華文學通史》，就是從中國文學總體發展規律來觀照澳門文學發展狀況的。著者特別首肯澳門當代詩歌發展的成就，這樣寫道：“在80年代澳門文學的崛起中，詩歌始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既作為一個主要的文體形式，活躍在澳門文壇上，也在創作實踐上，代表著澳門文學的藝術水準。較之散文和小說，澳門詩歌是堪與大陸、臺港和海外華文詩歌相提並論、接軌對話的一個領域。”^③與此同時，著者在談到澳門散文時寫道：“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匯、華洋雜處之地，雖則中華文化和散文傳統是創作的基本血脈和靈魂，但西洋文化的影響也是明顯的，這反映到散文創作中來，就表現為傳統的敍事、抒情、寫景、議論，與西方現代派慣用的象徵、變形、夢幻、荒誕等技巧，都在澳門散文中或單獨或交融第得到運用……。”^④可以說，這些表述都是在中國文學總體發展規律的前提下，對澳門文學發展作出的概括性的言說，不可能也沒有必要面面俱到。這也難免引起“身在其中”的澳門作家和學者的質疑與追問。澳門詩人陶里就在文章中

^② 劉登翰，《澳門文學概觀》（廈門：鰲江出版社，1998），1。

^③ 張炯、鄧紹基、樊駿，《中華文學通史》第8卷（北京：華藝出版社，1997），438。

^④ 張炯、鄧紹基、樊駿，《中華文學通史》第10卷（北京：華藝出版社，1997），353。

表示：“遺憾的是，《通史》對澳門的小說和戲劇的撰評付諸闕如，留下兩片空白。筆者寄望研究澳門文學的學者沿着《通史》的路向，為澳門的小說和戲劇等持平地嚴肅地定個調。”^⑤所謂留下兩片或多片“空白”，恐怕主要由澳門區域文學工作來填補。在這裏，可以明顯地看出地域或區域文學研究的作用和功能。中國古代文學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屈原、李白、杜甫、蘇軾等都是家喻戶曉的偉大詩人和作家，弘揚祖國的傳統文化，對這些偉大的詩人和作家進行深入研究和評介十分必要。然而，不是每個地域或區域都產生過這樣偉大的詩人和作家，即使文化很發達的區域也不可能每個朝代都有屈、李、杜、蘇這樣的詩人和作家產生。一部中國文學史，能被列入章節的可能只有一二百人，而整個中國各個區域在某個時代會產生過影響的詩人和作家則以千計。一些不可能受到中國文學史重視、甚至沒有機會進入中國文學史的詩人和作家，不僅歷史上曾使某一區域的人民自豪過，而且至今仍是這一區域人民追懷的物件，使他們產生自信心。這個道理，或許能幫助我們理解澳門區域文學與整體中國文學發展研究的辯證關係。

20世紀80年代以來，澳門文學之所以處於一種螺旋式上升的態勢，其中因素很多，外部的與內部的，群體的與個體的，客觀的與主觀的因素都有。然而，在文學本體內部，創作主體的因素，是文學發展諸多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澳門文壇有一批真正把文學創作當成了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的作家，他們是真正從靈魂深處酷愛文學創作的一群。誠如澳門學者李觀鼎說：“在澳門文學發展的過程中，確乎存在着一種強大的執拗，不絕如縷。須知，澳門沒有專業作家，在沉重的工作和生活負擔雙重壓力下，竟有那麼多人致力於詩歌創作，這實在是小城文化風景的一大特色。設若慮及整個社會已為物質消費所引領，這種景象就顯得彌為珍貴了。”^⑥澳門作家的韌勁和毅力，令中國其他區域作家由衷的感佩。

在當下，世俗化與商品化的猛烈衝擊，純文學紛紛向俗文學“歸降”；反主流意識形態與後現代情緒的不斷升溫，文學創作中出現消解經典神話，淡化人文精神的現象；在電子媒介大行其道的時代，人們對文學存在的空間

^⑤ 聰里，〈澳門文學在觀察〉，《香港文學》7（1999）：13—14。

^⑥ 李觀鼎，〈澳門現代詩·自序〉（澳門：澳門基金會出版，2007），18。

和發展的前景充滿着憂慮。美國學者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在中國發表演講時就一再表示文學的終結。米勒在《文學評論》2001年第1期發表《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一文，引用了法國解構主義大師雅克·德里達的一篇題為《明信片》作品中主人公的一段話：“……在特定的技術王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影響倒在其次），整個的所謂文學的時代（即使不是全部）將不復存在。哲學、精神分析學都在劫難逃，甚至連情書也不能倖免……”在中國內地，已有部分作家改行從事視覺藝術，批評家改行從事文化批評。恰恰就在此時，澳門作家卻能堅守自己的精神家園，肩負着社會、工作、家庭多方面的壓力，長期堅持業餘創作，甘得寂寞，筆耕不輟。周桐在澳門文壇可稱得上一位多產作家，但她從來沒有滿足過已取得的成績，相反，她一直都在孜孜以求，在自己鍾愛的文學創作道路上默默耕耘，慘澹經營，果實累累。林中英說自己寫作已經成了習慣，做慣了，不做不行，也不願意放手。用林中英自己的話說，寫作已成了她生命中的一個“停不了的癮”，是一種“實現自我”。在澳門文壇，已逾千萬字創作成果的資深作家魯茂，風趣地把他做中學語文老師的正業稱為“妻子”，把他酷愛的文學創作的副業稱為“情人”，二者都不偏廢，二者都有不俗的成果。澳門作家主體精神的難能可貴，對研究整體中國文學發展，尤其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完全可以提供鮮活的參照系。特別是研究中國當代作家的創作心理，從中完全可以得到一些正面的積極的啟示。澳門沒有專職作家，他們為了生活，在追求外在生存需要和目標的同時，其內在精神生活是相當充實的。澳門作家關注人的靈魂、關注生存、關注社會人生最根本的問題。倘若把思考深入到澳門作家的心靈深處去探究，那是一種內在的精神需要狀態，一種只有澳門作家自身才能體驗到的快樂，一種自由的、從容的詩意美和創造美，一種精神的高級追求和自救。

區域文學研究工作的長處在於，它不僅可以提供大量、鮮活的文學史料和文學資料，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出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文學通則，以供整個中國文學文學研究參考。如前所說，區域文學研究與整體中國文學研究的關係，是局部與整體的關係，可以相互補充、相輔相成。澳門區域文學發展研究，不僅可以推動和促進整體中國文學研究走向深入、全面，而且也能

使中國文學各個不同區域文學呈現出豐富多彩的面目，從而更能體現出整體中國文學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二、澳門文學是澳門文化的載體，澳門文化是澳門文學發生發展的一片土壤

饒凡子曾打過一個比方，如果說文學是花，那麼文化就是花賴以生存的土壤。澳門文化滋生了澳門文學，反過來，澳門文學又豐富了澳門文化的內涵。澳門文學涵蓋三方面的內容：一是東西方文學創作中與澳門有關的文學作品；二是澳門本土的華文文學創作；三是澳門土生葡人文學。其中，以澳門本土華文文學為核心，相容並包其他方面的文學創作。這三方面的文學風貌，構成了澳門文學的特質，即特殊的性質或品質。澳門文學的特質是澳門文化造就的。

有學者說澳門是“小地方，大文化”，並把澳門文化說成是一種“跨文化”^⑦性質，是有道理的。文化是歷史的投影，是時間積澱的產物。要瞭解澳門文化特徵，就不能不追溯澳門四百年的滄桑歷史。早期西方人由澳門進入中國內地，從明至清進入中國的傳教士，大多數由澳門聖母祿學院出身。幾百年來，中西文化在這裏相遇、交匯、融合，西方背景和中國語境使得澳門地區的文化有了差異性、共同性和多向思維性的特徵，澳門成了一個“跨文化場”。澳門兼有地中海式的和中國嶺南風格的，帶有鮮明南歐風格的建築，還有許多中西合璧的建築群。澳門城市不大，但信仰各種各樣宗教的人甚眾，是一座充滿宗教氣息的小城。澳門人口構成複雜，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各有自己的方言和次方言，被稱為“語言博物館”。“土生葡人”族群生活在中西文化邊緣，兩種文化都在他們的物質和精神層面上表現出滲透和交融的跡象。

在澳門文學作品中，讀者不難看出它具有獨特的跨文化性質。在詩歌中，明清時代內地文人來到澳門，看到的是澳門作為當時繁盛的東西方貿易港場景；是澳門附近海域中國南方水上居民疍家的獨特生活；是居澳葡人的

^⑦ 饒凡子，《世界華文文學的新視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173。

使用器物與風俗習慣；是中國詩人與居澳西洋人的友好交往；是中國詩人帶有敏銳新奇而又不離乎中國文化的目光看待西方事物；是澳門的歐陸風光，它的“西洋味”。湯顯祖《香澳逢賈胡》：“不住田園不樹桑，瑤珂衣錦下雲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敘述他在澳門遇到的販運珍異珠寶的葡國商人的情形。屈大均《望洋臺》中有“洋貨東西至，帆乘萬里風”的詩句。魏源在《花園聽夷女洋琴歌》中，表現了一個中國文人對西洋音樂的感受和理解。這首詩，第一部分描寫詩人乘着天風，遨遊四方，被吹到充滿西洋情調的澳門。“天風吹我大西洋，誰知西洋即在澳門之島南海旁”，氣勢磅礴，不同凡響的開頭，為整首詩奠定浪漫主義的基調。第二部分描寫風琴的音樂效果，而以與澳門關係至為密切的大海，作為這首樂曲的主題。第三部分抒發詩人的感慨。詩人感到中國人與西洋人雖然在地理上相距遙遠，卻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彼此的感情是可以溝通的。韓鵠《澳門番女歌》第一首這樣描寫西洋少女：“樓頭一見已消魂，性本聰明態本嬌。時嚼檳榔還默默，玲瓏玉質透絞綃。”該詩綺羅香澤氣甚濃，乃至有輕薄之嫌，但描寫澳門西洋少女的詩篇，當屬最早。而葡國詩人庇山耶在他的詩歌《中國二胡》中，則具體描述自己在那悠悠的二胡聲中，如何被“二胡的泣訴之聲所觸痛”，使得他的“心會振起小小的雙翅，痛苦哀傷地撲翼掙扎”^⑧，抒發了一個西方文化人對中國藝術的感受和理解。

在澳門小說創作中，魯茂的長篇小說《白狼》，主人公吳白朗就是一個中葡混血兒。白朗受不住引誘誤入歧途，加入黑幫組織，但他並未因此找到自己英雄主義式的滿足感，卻看到人性中最卑鄙最殘暴的一面。他在被奴役、利用和血雨腥風的互相殘殺中，傷痕累累地付出沉重代價，最終覺醒，勇敢闖出黑窟，走上自新道路。作品以白朗為中心，伴隨着他如謎般的身世，描寫澳門地區下層人民的生活和黑社會的活動，筆觸伸向鮮為人知的葡人生活側面。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也表現出一位澳門作家的良知和勇氣。周桐的《流星》寫一個越南難民眼中的葡人家庭生活，有許多新奇的發現。而她的成名作《錯愛》，寫一個為愛而死的白人安琪與華人男主人公的私生

^⑧ [葡]庇山耶，《滴漏》(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95。

子小里蒙。私生子給幸福的家庭帶來風波，而小姨又趁機欲搶走姐夫；女主人公尤琴因乳癌失去女性特徵，對丈夫更是疑神疑鬼，夫妻感情出現嚴重危機，最後終能以互愛戰勝一切。陶里的《百慕她的誘惑》，其中有寫中葡男女戀愛和婚姻，涉及到各自不同文化傳統上的追尋。土生葡人作家飛曆奇的長篇小說《愛情與小腳趾》、《大辮子的誘惑》和短篇《疍家女阿張》等，回溯到歷史的深處，再現了不同歷史時期澳門的土生葡人與華人的生活側面。飛曆奇在《愛情與小腳趾》這部作品中，不僅向我們講述了一段曲折的愛情故事，更重要的是帶讀者回到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澳門，探視當年的事物，以及當時土生葡人的思想感情。隨着故事的發展及主角所到之處，作者把昔日澳門的人、事、景、物、情，一一再現。在《大辮子的誘惑》這部作品中，“值得一說的是，飛曆奇雖然是出生在土生葡人傳統世家，但是他在小說中對阿多森杜和阿玲的跨族婚姻是採取正面的、讚揚的態度的，不帶有雜種偏見，表現了作者期望的一種族群的文化理想。”^⑨他在作品中對華人和中華文化所持有的態度，已不完全是一個“異族人”的視角和感知。再例如，土生葡人女作家江蓮達的短篇小說《長衫》、《施捨》和《承諾》，女主角都是具有跨文化意識的華人，表現出土生葡人作家對澳門華人生活及其文化關注以及追尋相互理解的願望。土生葡人女作家瑪爾丁妮，她在1993年於紐約出版的《廢墟的風——回憶澳門的童年》，雖以回憶的形式敍述，但運用的卻是文學藝術的表現手法，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文學作品。我們從她的作品敍述中可以看到，家庭的歷史、土生族群的歷史，作者自己的生命，都無不緊緊地與澳門這塊土地連接在一起，顯示了土生葡人作家心靈深處一種強烈“根”的意識。

上述詩歌和小說，都是在特定的澳門文化背景下產生的。相信在中國其他區域文學中，是不大可能出現這種跨文化意義的文學作品的。澳門文學與澳門文化的相得益彰，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文學與研究文化的一個範例。但是，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二者畢竟有不同的質的規定性。前面我們談到的“載體”、“土壤”，只能是對文學與文化的關係的一種感性比喩，而真正

^⑨ 郭濟修，《飛曆奇小說研究及其他》（澳門：澳門文化廣場出版，2002），44。

操作起來，一定要有清醒的理性認識。

三、澳門文學研究的過程中，存在着可供比較文學研究拓展疆域的新視點

在國內，人們一般習慣把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看作一個獨立的學科領域。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與比較文學是兩個不同的學科，但由於這兩個學科的物件都是跨地區、跨國別的，都具有世界性、開放性的特點，因而有許多交叉和可以相互跨越的研究視點。

首先，澳門文學的發展為比較文學提供一個富有創造性的探討對象和新的學術研究空間。比較文學的學科精神、學科個性在於“跨越”二字。興起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比較文學，它是歷史地比較研究兩種以上民族文學之間互相作用的過程，文學和其他藝術形式（如繪畫、音樂、雕刻、建築）以及其他意識形態如宗教、哲學、純科學等關係的學科。它是在各國文學發展、交流和影響的基礎上產生的。它通過跨文化、跨學科等的文學研究，開展與世界各民族文化與文學對話，促進共識、互證、互補，實現不同文化與文學的溝通和理解，尤其可以對中西異質文化形成溝通與對話。“對話”的文學研究，就是“接受者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充份肯定對方的價值方面，擇優而取，在詰難對方中發現不足，予以揚棄；用宏放的目光看待外國文論中的異質性部分，顯示其自身價值，尊重其在理論整體中的積累，同時也不忌諱接受一方——對話者的價值判斷與觀點。”^⑩如前所述，在澳門詩歌和小說創作中，有大量的中西“互觀”式作品；而在戲劇和散文創作中同樣呈現着這種情況。諸如，余潤霖的歷史劇《斷雲流水》，以天主教神父利瑪竇四百年前來中國傳教為題材，寫到中西雙方文化最初交流的情景。劇本寫利瑪竇遠渡重洋來到澳門，學習中國文化，堅韌地叩開了中華帝國的“紫禁城”。他由澳門——肇慶——韶州——南昌——南京——北京，逐步開拓了傳教的新天地，與此同時，也為中國帶來了先進的科技，他又率先向西方國家推介中國文化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鄭繼生的現代歷史劇《鏡海濶

^⑩ 《錢中文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416。

情》，向人們講述“近代強國之路的探索者”——鄭觀應的祖居——“鄭家大屋”，從1941年至1986年之間所發生過的戲劇性事件：抗戰時期難民如潮湧來澳門的艱苦歲月；70年代鄭家大屋新一代的兒子要出國，女兒要嫁給土生葡人並移民，導致與父輩的矛盾；80年代鄭家嫡孫偷渡來澳聲言逐客收屋；90年代一位青年鬧同性戀，家庭掀起另一場風波；1995年業主對租客下逐客令，限時搬遷，眾人只得慨歎：天下無不散之宴席；1996年鄭家大屋被列為保護文物，倖存不毀。劇情借鄭家大屋一角，鋪開澳門人的眾生相。徐敏的散文《澳門新八景隨想》，描述了澳門的中葡文化勝景，傳達的是這個地區的跨文化的資訊。吳志良的《作別西天的雲彩》寫其在葡國時生活在周圍的友好、親善的葡人，他與他們的友誼。李麗青的《少年亞底爾斯的煩惱》寫印巴裔青年面臨着家庭包辦婚姻的苦惱，他雖然有抗爭意識，但在民族傳統文化背景下生活，他很難逃脫悲劇的命運。馮傾城的《她的第二次愛情》寫的是中菲青年跨文化的愛情悲劇。在以上“互觀”式的作品中，蘊含着具有深遠文化意義的命題。如不同文化體系的文學作品如何構造“他者”形象問題，從澳門文學作品中所塑造的“他者”形象，可以看到文化中異國層面的“對話”，民族間的相互看法，文學想像間的相互詮釋。這是一種文化在另一種文化的“鏡像”和“折射”，可以看作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解讀，具有特殊的比較文學研究意義。

其次，澳門文學的發展研究為比較文學的地域或區域比較，尤其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內涵。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傳統的比較文學的跨國別、跨學科和比較詩學的研究範式中，較少有關於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的闡釋。在這方面，澳門文學研究為比較文學提供理論參照是極其有限的。即便是現在，國內學界對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在推動中華文化與文學走向世界的作用還沒有投入足夠的關注。以澳門文化研究為例，學界關注的是文化現象本身，而不是理論的概括與提升。澳門特殊的地理區域、東西方交通樞紐、中西文化的交匯點、“華洋雜居”的移民社會，等等，構成了澳門文化的歷史淵源。澳門的城市景觀、宗教信仰、語言、節慶習俗、“土生葡人”，等等，構成了澳門文化的多元特色。據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澳門社會科學學會2002年1月編印的《肇澳文化與旅遊發展的新構想——第十五次

粵澳關係研討會主題報告》透露，估計收藏於世界各地包括十多種東西方語言文字的澳門歷史文化檔案，總數約有150—200萬件，其數量是敦煌文書的數十倍，其中一部分藏於澳門圖書館。然而當前對澳門文化的研究，以重複研究居多，以泛論成果居多，而專門研究澳門自身的社會文化史、政治文化制度史、宗教文化史、交通史、藝術史、文學史、建築史，尙很稀少，成果也較單薄。而研究澳門與中國內地、與海外各種文化要素和文化層面的交流整合和影響等，就更顯得寥落，亟須進一步開拓和加強。相比之下，澳門文學研究中的理論性論著也顯得滯後。眼下，《澳門文學概觀》、《澳門戲劇史稿》、《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這樣的宏觀研究論著，儘管其中還有不少值得商榷、討論的問題，但畢竟數量不多。只有這樣的宏觀研究論著，才能讓人們全面地看到“澳門文學形象”，才能為比較文學研究提供一些理論性的參照。饒凡子早已看出澳門文學研究對比較文學研究的意義，在《海外華文文學與比較文學》、《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新視點：海外華文文學的比較文學意義》等文中，已有詳盡表述。她在2006年8月“澳門的文化生態及人文精神研討會”上，提交一篇幾百字短文《比較文學視野中的澳門文化》中指出，澳門是一個“跨文化場”，可作為一個地區的文化個案，將其置於比較文學的視野中，對其進行深入具體的研究，共同挖掘澳門文化的傳統優勢，繼續發揮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結合點、輻射點的功能，形成一種前所未有的互動力。這從中國和世界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也具有未來意義。

(張建華 廣州 廣州大學人文學院)